

从旗袍的兴衰看近代中国女性意识的变迁

熊九润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7-0008-02

摘要:旗袍的产生、兴盛和消退的过程,折射了中国近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旗袍是女性开始觉醒的标志,同时旗袍又有其局限性,它的审美形态仍然是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观照,旗袍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消逝表明中国女性又一次堕入了自身的盲视,其兴盛和消退体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

关键词:旗袍 女性意识 近现代

服饰的变迁是思想意识的颤动,能够体现人的思考,展示人的精神和生活态度。因此,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服饰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观点:“这三者——衣装、身体和自我——不是分开来设想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想象到的。”^[1]而且,在这三者之外,加上另外一项——性别,这个整体才会显得更加完整。旗袍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性服饰中一支独秀的奇葩,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到消退这一系列过程不仅展示了女性身体的解放,亦体现了女性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

一、旗袍的诞生:女性意识的试炼

清代女性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极度宽大且繁复,张爱玲曾说:“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2]这一时期女装普及宽衣大袍,衣服长及膝盖,袖口和下摆又宽又阔,宽大的裤腿使裤子看起来像裙子,袖口、领口、衣裤的下摆都镶嵌着很多道精致的花边,而且越是讲究的衣服镶嵌的花边就越多,有“十八镶”之说。中国男人制定的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和一道道花边的对照下失踪了。宽大的衣装配合缠足,不仅束缚了女性身体和行动的自由,也禁锢了女性心灵的自由。有血有肉的身体的自由和美丽消失殆尽,女性被彻底物化,成了衣服架子。

1911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在废弃清朝封建等级制服的同时,制订了新的礼服标准,规定女子礼服用长与膝及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得加以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褶,上缘两端用带。^[3]这样的服式带有明显的前朝色彩,深陷父权文化的男性精英们显然没有真正重视女性的服饰变革。民国的女性没有听从挽救她们脱离苦海的精英兄长们的建议,而是开始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着装方式,建立起新的时尚观念,新式旗袍由此诞生了。

192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打破了旧的思想观念,承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废除了封建礼制,促进了女性身心的解放。旧的社会风气被摒弃,新的社会风气还未完全形成,新旧交替创造了宽松的空间,女性可以大胆地表达对美的追求与渴望,在较早开放的上海、广州、南京、北京等地,女性追求新潮、时髦,已蔚然成风。

“20年代中叶起,一种新旗袍诞生。上海旗袍时尚的最初,是以无袖的长马甲形式出现的,短袄外面的长马甲代替了长裙。1926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民国旗袍最初的款式。”^[4]改良的马甲旗袍衣身宽松、线条平直,下摆至脚踝或小腿处,袖子采用倒大袖,领、襟、摆等部位做镶嵌装饰,成为新式旗袍的雏形。从此时到30年代末改良旗袍出现,旗袍的式样迅速变化,主要是长度缩短,腰身收紧,曲线明显。旗袍开始收腰,腰线较低,胸部、腰身、臀部的曲线略突出,虽仍为倒大袖,但袖口变小,装饰也趋于简洁,下摆长度逐渐变短,摆线提高至膝盖处,露出健

美的小腿。这种新形象抛弃了传统女装对身体的否定,开始强调女性的个人意愿,而不再完全是纲常礼教的强迫。

二、旗袍的兴盛: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观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发展的全盛阶段,新式旗袍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最后的变革,并发展成熟。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有了“曲线美”的意识。^[5]因此不同于之前的通体剪裁,改良旗袍在制作上受到欧美服装造型和制衣技术的影响,不断进行工艺改进,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旗袍的衣身有了前后片之分,用肩缝连缀,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还加胸省、腰省等,使腰身更加合体。许多欧美流行元素,如拉锁、按扣、垫肩等小配件也被旗袍引入。配合中国传统盘扣、立领、右衽、边饰,旗袍在这时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但是,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表现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6]这样看来,东西方文化元素兼用的旗袍正是体现了一种女性对新旧观念以及男权文化的妥协,折射出中国女性当时所处的尴尬而艰难的社会处境。

对于旗袍风尚的推动有一个让我们不得不提的特殊群体——青楼女子。她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在潮流时尚中却处于领袖地位,“任何时候,风月场所都是引领时尚的消费先驱”^[7]。出于功利目的,风尘女子在穿着上从来都不是拘泥于旧俗的,什么样的衣服可以让自己更吸引男人的眼球、招揽更多的生意,深谙穿衣之道的她们就进行什么样的革新。良家女子虽然对妓女深恶痛绝,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许多人苦于自己的良人迷恋于风月场所,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模仿青楼中人的装扮,旗袍就这样变得日新月异起来。这种情形造就的时髦旗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权文化的烙印,迎合了男性的审美需要。中国的女子仍然活在男权构筑的世界里。

三、旗袍的消退:以平权为名的归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崇尚革命领袖和革命运动,代替了其他的一切一切,上海的领导全国服装潮流中心的地位,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8]旗袍的形式简化,逐渐形成一种固定模式:立领,长身收腰,低开衩。很少使用刺绣、镶嵌等装饰工艺,用色单纯,面料多为中低档。并且随着政治引领的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旗袍所代表的舒适、悠闲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60年代,旗袍连同配饰一起,在中国大陆几乎销声匿迹了。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压倒一切,更多的代表中国劳动女性、能展现新时代和革命的女性服装成为了主流,女人们换上了人民装、中山装、“不爱红装爱武装”。

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述的女性生活的世界是尴尬而艰难的,但尚有旗袍来流露出女性典雅、柔美的性情和气质,那么在新生的政权中,领袖的一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不仅要和男人一样劳动,在服饰上也成为了男人一般,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不脱衣服,不知道她和她有什么不同。^[9](下转第19页)

作者简介:熊九润(1988—),女,汉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业方向:专门史

图被完全消解。目标与结果的不一致，即产生了荒诞感。

此外，世界也是不可知的，由一系列的偶然因素构成，无逻辑规律可言，人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孩子们上岸后不久，就有一艘船经过，而此时杰克却把人带去打猎了，致使烟火熄灭，孩子们失去了一次绝好的获救机会，这一次的失误使大家的困守无限期延长。西蒙被杀害的那个晚上，暴雨来袭，猎人们因为猎回野猪而狂欢，也正是这个时候，西蒙发现了野兽的秘密，但他又不合时宜地发病了——西蒙就这样宿命式地落进了狂欢的队伍中，被陷入狂乱的众人殴打致死。作品结尾，杰克准备放火烧死拉尔夫，却没想到大火和浓烟引起了一艘巡洋舰的注意，在大家都对获救不报希望的时候，救援却突然从天而降。由此可见，世界是荒诞的。萨特认为：“荒诞”的实质就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合理之间的冲突。”人类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当人类在荒诞的世界中内审自身行为并力图使其回归合理的轨道时，不合理的外部现实与追求合理的内在意识却总是发生冲突，一切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拉尔夫、皮吉和西蒙一直渴望获救，但当救援终于降临，这还是他们曾经希望的“被救”吗？人性沉沦，童心泯灭，生者或是饱受摧残或是性情大变，而死者却只能孤寂地在茫茫大海中消散。

面对陌生而令人恐惧的荒岛，孩子们选择用“狂欢”来应对。杰克用泥巴和血将自己涂成花脸，“使人隐藏起真相的涂脸带来的是野性的大发作”，“假面具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杰克在面具后躲着，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面具(花脸)在原始狩猎与战争中兼有使对象迷惑和掩饰自身恐惧感的作用，在狂欢仪式上也可使人淡化或摆脱日常规则及自我意识。面具在儿童游戏中是常用道具，它与隐藏其后的人的区别就如游戏与真实的区别。一旦面具与人性同一，游戏与真实的界限被打破，恶就作为一种潜能浮出水面。^⑨但不是面具改变了孩子，而是孩子选择了面具。他们借面具屏蔽了羞耻感、负罪感，将深藏内心的施虐、嗜杀欲望无限制地膨胀开来。

这群来自现代社会的孩子还自发举行了几场具有原始意味的游戏和仪式，比如模拟野猪被猎杀的场景、狩猎时对老母猪的施虐、将猪头作为祭品献给野兽，以及最后杀害西蒙时的那场群魔乱舞。这群猎人追求的不是狩猎的结果，而是杀戮的快感。在一次次的杀戮之后，人的意识也在渐渐发生变化，正像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一旦见了血不再害怕，认为流点热气腾腾的鲜血是无所谓的事，那么这个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那条具有决定意义的不祥之线，不再是个人了，而成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的原始野人，伸出那张额角很低、獠牙露出的丑脸，直勾勾盯着我们的时代。”^⑩邪恶的蝇王已不能满足只有动物的敬献，他更需要人类的鲜血，西蒙在“杀野兽哟！割喉咧！放它血哟！”的嚎叫中成为了最后一个祭品，这次血祭也成了孩子们与纯真的彻底告别仪式。

(上接第8页)也不知道她和他有什么不同，女人的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一并被抹煞了。她们的形象在政治的干预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单调，又一次堕入了身体的盲视。

然而，这样的一路走来的局面不是女性自觉规划的，而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借用福柯的语言，“规训……是权利的个体化技巧。规训在我看来就是如何监视某人，如何控制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他的态度，如何强化他的成绩、增加他的能力，如何将他安置在最有用之地。”^⑪^⑫福柯认为，专制时代的统治者要用严刑峻法惩罚身体暴力的力量，但现代的权力持有者对待囚犯越来越“温和”和“狡诈”，他们想以温和的方式得到囚犯从身体到心灵的自动屈服。按照这个观点，男权制正是采用了“温和的”技巧，将对待女性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先后纳入美丽时髦、平等解放的范畴，用高尚的范畴标准遮掩住了实际上的痛苦，女性的身体和灵魂在这些看似美丽的标准下变得温驯起来。百年来中国女性的解放意识在新旧交替的二三十年代经过短暂的试

三、原罪的驻留，理性的拯救

在《蝇王》的题序中，戈尔丁说：“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戈尔丁认为，宗教“原罪”思想似乎比科学理性原则更符合客观现实。在他眼中，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面临着无处藏身的危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不是来自外部的任何力量，而是源自蛰伏于人心灵深处的人性之“恶”，“恶”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而这种“恶”一旦有了机会便会蠢蠢欲动。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孩子们失去了文明社会道德、法律、宗教的束缚，心中的恶被唤醒，外化为强大的破坏力。小说以“蝇王”为题，寓指兽性战胜了人性，孩子们害怕不存在的野兽，而真正的野兽却是潜藏在人性中的恶。

戈尔丁亲身经历了二战，深感世界种种严重缺陷，他认为究其本源是人类天性的不完美。人类创造了种种现代文明，自我力量的无限膨胀消解了理性，历代先哲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成了异己力量，反而残害人类自身。作品通过《蝇王》中善恶阵营的斗争以及恶势力的胜利，表现了人性恶的主题；但作品的意义不只停留在此，作者还为人类战胜这种恶指出了一条道路：即认识自己。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了解自己，而且不想去了解人性中的黑暗。而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敢于正视现实，而不是对罪恶熟视无睹。拉尔夫最后因发现人的天性泯灭、人心黑暗而嚎啕大哭，体现出作者对人类文明和人性之善的维护和渴求。文明与理性，即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必由之路。

作品中的拯救思想就体现在西蒙的身上。当其他孩子们都对野兽避之不及的时候，西蒙一个人上山去弄清楚野兽的真面目。他发现一直被大家所惧怕的“野兽”其实是一具烧焦了的飞行员尸体，并勇敢地扯下尸体上的降落伞，让这个梦魇一样的尸体飘落大海，想借此彻底消除大家的恐惧。通过与蝇王的对话，西蒙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真正的野兽其实是人，野兽在人心中。西蒙发现了人性恶的事实，要将其公之于众，并最终用死亡保存了自己的善，捍卫了人类的良知。西蒙这个角色为作品人性恶背景添上了一抹微弱的亮色，也预言了人类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威廉·戈尔丁.蝇王[M].天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2]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3]杨雨时,刘春阳.荒岛实验室里的现代启示录——论小说《蝇王》揭示的现代人类社会问题[J].东北大学学报,2010,12(6).
- [4]陈静.燃烧的方舟——从《蝇王》看戈尔丁的人类生存境况观[J].兰州大学学报,2008,36(6).
- [5]田俊武.威廉·戈尔丁的宗教人性观[J].烟台大学学报,2010,23(2).

蓄，随即陷入了弹萎。

参考文献：

- [1][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都市元宝译.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张爱玲.更衣记[A].华梅.张爱玲典藏全集.3,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 [3]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
- [4]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
- [5]缪良云.中国衣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 [6]张耀铭.娼妓的历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7]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8]福柯.言与文[A].杨大春.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2000(4).